

二十世紀初葉
日本人移民美國對華人之衝擊

王 秀 惠 著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29 期抽印本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六 月

二十世紀初葉 日本人移民美國對華人之衝擊

王秀惠*

提 要

歷來學者有關美國華人的研究，甚少探討華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關連，因此無法完整地呈現美國華人的生活經驗。本文主要從美國華人和日本移民之間的互動，探索華人身處美國白人社會的其他面貌。

自從十九世紀八〇年代日本人移入夏威夷地區之後，美國地區的華人和日本人展開一連串複雜的交往歷程。本文以日本人移入美國之後，美國華僑對母國的民族情感及其對東亞地區國際態勢的關切，如何牽扯華人、日人在白人社會下的社經互動；並且針對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本土的排日運動發展，觀察華人對於這些運動的觀點與回應。文中經由不同面向的探討，檢證美國華人看待日人的方式，說明移民寄人籬下，為了爭取生存機會而貶斥其他少數族群之現實壓力，造成彼此不易聯盟之原由；並凸顯東亞國際局勢變革、華僑的民族主義、和白人社會種族歧視機制所扮演之角色。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之後，自以為種姓、文化、階級高於中國一等。移民美國的日本人不但以此鄙視同為黃種的華人；更因襲排擠有色人種的白人種族觀，極力和華人劃清界線。就華人而言，在美國遭受白人的排擠和歧視，促使他們關注中國的政經局勢，冀望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可以幫助海外華人改善在居留國的待遇和社會地位。東亞地區國際間的任何變革，不免也左右了美國華人看待當地日本移民的方式，使得在美華人無法跳脫中日兩國對峙態勢，反而於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本土排日風潮日熾之際，將敵視日本國的民族主義情感轉為接受白人的種族偏見而敵視同為少數民族的日本移民。此舉不僅扭曲了華人看待日本族裔的觀點，也蒙蔽他們認清自身也是白人社會種族偏見制度的受害者；徒然分散彼此的力量，喪失結合亞裔，共同向美國主流社會爭取平等待遇之契機。

關鍵詞：美國華人 美國日本移民 排日運動 加州外人置業禁例
一九二四年移民法案 種族歧視 中國民族主義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曾於2000年12月27日發表於歷史系教學研討會，蒙與會同仁指正，復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前言

有關海外華人的研究，許多題材集中於華人社群與當地主流社會之間各方面的互動關係；美國地區的華人研究亦然。¹但是近數十年來，由於眾多學者的勤奮耕耘，研究題材與關注層面逐漸多樣化。研究方向不斷探觸從前為人所忽略或涉入未深的領域。此中之一就是由探討少數族裔（如亞裔、非洲裔、西班牙語裔等）與寄居地白人社會的互動關係伸展出去，進而透視他們與其他同為少數族群相互之間的牽連與糾葛，裨使各個族群過往的生活經歷呈現更為完整的面貌。

本文將以此精神為依歸，探索美國兩個最大的亞裔族群——華人與日人——的往來互動。²以前有關這個議題的研究多數反映中日兩國國際關係的惡化（尤其是七七事變之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導致美國華人與日本移民發生衝突的主因。³近來有些研究則專注於華人與日人兩族群在美國加州農村鄉鎮中

1 較為早期的著作，如 Elmer C. Sandmeyer,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39);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探討十九世紀末葉加州勞工組織，政治活動，與排華運動的關係。近來雖然有許多著作觸及華人經濟活動，如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或是以法院紀錄探討華人如何試圖突破白人的律法壓制，如 Charles J. McClain,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以上都是針對華人在白人社會裡的生活經歷為主。只有少數著作探及華人與其他族群如南部黑人之彼此關聯，見 James W.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Lucy M. Cohen, *Chinese in the Post-Civil War South: A People without a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以下行文，將美國華人與華僑並用，但仍有區分。有關華僑 (Chinese sojourners) 與海外華人 (Overseas Chinese) 之分際，主要在於中國民族主義之意識型態上。前者以強烈中國民族主義為原則，強調無分處所，所有中國人，都是屬於中華民族的一員，仍要效忠於中國。後者則與移居地有較多互動，甚至具有認同當地之意識。參見王康武，《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三年，頁8-9。文中以此為準，面對美國多種族社會時，採用華人；面對母國時，則以華僑稱之。

3 有關一九三〇年代至二次大戰的中日兩國衝突而延燒到海外移民團體的研究，日裔和華裔學者都各有成果，例如 Yuji Ichioka, "Japanese Immigrant Nationalism: The Issei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 *California History* 69:3 (Fall 1990): 260-311。華裔學者則有于仁秋 Renqui Yu, *To Save China, To Save Ourselv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至於專研二次大戰之前的時期，則參見 Gay Michiko Satsuma, "Japanese Immigrant Patriotism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and Russo-Japanese Wars, 1894-1905"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0)。

因為經濟利益衝突而生的事件。⁴兩者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前項研究過於重視中日國際情勢發展對華僑的影響而忽略海外移民在當地環境適應過程中所產生的自覺意識。後者則是侷限於地區性的偶發狀況，見樹不見林，無法掌握其在整體華人、日人移民團體兩相互動的歷史脈絡中之地位。本文企圖綜合兩種類型之優點，以日本人移入美國之後，美國華僑對母國的民族情感及其對東亞地區國際態勢的關切，如何牽扯華人、日人在白人社會下的社經互動；此外，針對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本土的排日運動發展，觀察華人對於這些運動的觀點與回應，則是本文的另一個探索焦點。文中將以排日運動中三個事件（一九〇六年舊金山市日本學童就學事件、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二〇年加州外人置業禁例、和一九二四年移民法案）為主，檢視華人看待日本移民之觀感，如何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種族歧視氛圍和東亞國際變局之影響。以這些問題為中心，結合國際情勢與美國本土特有情境，釐清華人與日本移民之間複雜而糾葛之關係。

自從十九世紀八〇年代日本人移入夏威夷地區之後（此區於一八九八年併入美國），美國地區的華人和日本人展開一連串複雜的交往歷程。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嚴格限制華人移入美國。至一九二四年美國國會也通過移民法案，致命地打擊日本移民進入美國。⁵對許多住在美國多年的日本人而言，一九二四年移民法案（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可謂是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的翻版，美國華人在白人社會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再次歷史重演地加諸在日本人的身上。華人和日本人同為亞裔少數民族的團體，他們在白人為主的美國社會裡經歷著如此相近的命運，是否曾經牽動兩者之間產生惺惺相惜的感受，進而加強彼此相互合作的契機呢？哪些因素影響華人對待日本人的態度與行動呢？這些因素如何發揮其作用以及如何牽動彼此之關連呢？本文將由三個面向切入這些問題：（一）日本人進入美國本土之後，對華人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二）華人的民族情感對其移民生活的影響；（三）華人和日人合作之契機與困難。經由這些面向的探討，

4 例如 Eiichiro Azuma, "Interethnic Conflict Under Racial Subordination: Japanese Immigrants and Their Asian Neighbors in Walnut Grove, California, 1908-1941," *Amerasia Journal* 20:2 (1994): 27-56.

5 一九二四年移民法案採用配額制，一體適用於所有外來移民，其禁絕外來移民之手法，固然與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專門針對華人不同，但其阻斷日本人移入美國之效應，則與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雷同。有關一九二四年移民法案之制定方式，詳見本文第三節第三項。

檢證美國華人看待日人的方式，說明中、日移民不易聯盟之原由；由中並凸顯白人社會種族歧視機制的影響，以及東亞國際局勢變革和華人的民族主義所扮演之催化作用。⁶

本篇論文的資料以兩份二十世紀上半葉在舊金山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報紙——《中西日報》(Chung Sai Yat Po, or Chinese Daily Paper)和《世界日報》(Sai Gai Yat Bo, or Chinese World)——為主體；佐以美國移民局的調查報告、排亞聯盟(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的會議記錄及其他相關資料。《中西日報》由知名華人伍盤照所發行。伍氏年幼從廣東移民美國，半工半讀，進入神學院完成大學學業，並從此成為長老會牧師。有感於當時美國華人所受到不平等待遇，肇因於華人文化被許多白人所曲解與誤會，因而放棄佈道事業，專心致力於加強華僑與當地白人社會的溝通與瞭解，以期改善彼此的關係。伍盤照先生除了接受許多美國學校、機關、團體的演講邀約，四處介紹美國華人的生活形式與闡述華人所從出的中國文化之外，也藉由中文報紙的發行，引導當地華人了解美國社會和文化。另外一份報紙——《世界日報》——的發行量在舊金山地區僅次於《中西日報》，是由維新派人士所支持，其報導或評論也多涉及與當地華人生活相關的議題。⁷

一、日本移民對美國華人社經生活的影響

海外華人遷移至北美地區約在十九世紀中葉。相較之下，日本人移入美國本土則晚於華人約有三十餘年。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通過後，尤其是一八八五年起，數以千計的日本青年，有的直接由日本、有些輾轉經過夏威夷來到美國西海

6 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和東亞國際變化，不可諱言地，也應該同樣影響在美日本人對華人的觀感，並進而左右華人看待日本移民的觀點，但是本文以處理美國華人受到日本移民的衝擊為焦點，至於在美日本人如何建構他們對華人的觀感，日本民族主義和東亞局勢變化如何影響日本移民對待中國及其海外移民，則只在文中視前後脈絡所需，適時稍加補充說明。

7 Ronald Leslie Sobl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ld, 1891-1961" (MA Thesis: Stanford University, 1962).

岸地區。⁸到了一八九〇年代，日本人移居美國西部進入一個高峰期。當時因為全國性或是各州地方性的法規，外加整個西部地區對華人的排擠與歧視、甚至恫嚇行徑，已經有效地阻抑華工來到美國尋求就業機會。有些已經在美多年的華人面對當地白人社會的排擠與歧視，便轉往東部地區發展，或是根本就收拾行囊，歸返家園。日裔移民，趁此機會，取代華人進入許多原是華人所從事的工作。根據美國一八九〇年的人口普查記錄，當時美國本土日本移民人口有兩千零三十九人。十年之後，一九〇〇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日本人的數目暴增為兩萬五千人，增加比例超過前一次的十二倍。在這段期間，西海岸地區，由北邊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市，南至加州聖地牙哥市，各個城鄉都邑，逐漸地出現日本移民所聚集的社區；並從此展開華人與日人在美國白人社會中相互接觸的全新經驗。由下表比較二十世紀初期華人與日人在美國本土的人口增減，可以對兩者的消長，略窺一二。

年 \ 人口數	華 人	日 人
1890	107,488	2,039
1900	89,863	24,326
1910	71,531	72,157
1920	61,639	111,010
1930	74,956	138,834

8 見 Roger Daniels,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The Anti-Japa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and the Struggle for Japanese Exclusion* (New York: Atheneum, 1970), 2-3. 此外，有關日本人被引進夏威夷的情況，需要稍加解釋。最初將日本勞工引入夏威夷島不僅是因為勞力不足，同時也是藉以抗衡早先進入當地且為數逐漸龐大的華工。以一八八四年為例，當地約有一萬八千名的華工，佔島上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這些為數不少的華工，偶有抗爭、罷工、要求加薪等事件，使得當地甘蔗園的白人雇主，頗為頭痛。見 Clarence E. Glick, *Sopomers and Settlers: Chinese Migrants in Hawaii*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0)。一八九八年夏威夷併入美國本土之後，排華法案也一體適用於當地。此後華工不再進入該島，日本工人便成為甘蔗園的主要勞動力。他們要求園主加薪的抗議事件，也時有所聞。例如見《中西日報》，1906年10月12日，頁3。

十九世紀末葉移入美國本土的日本人，多數從事鐵路修築、採礦、農業開墾與瓜果採摘等戶外工作或是任職於鋸木、罐頭等工廠。有趣的是，他們獲得就業機會的方式之一是經由華人的仲介和契約包工，將日本勞工介紹給與華人原先所熟識的美國白人雇主。華人因此成為一些行業的勞力仲介商。以西北地區的鮭魚罐頭工廠為例，華人在一八六九年太平洋區鐵路完工，以及一八七〇年代初期加州經濟景氣蕭條之後，逐漸轉往他州就業，成為西北海岸及阿拉斯加鮭魚罐頭加工廠的工人，並熟悉分離魚肉和魚骨的工夫。在處理鮭魚的過程中，剖切魚肉的屠夫最需要熟練的技巧，以便在最短的時間取出最多的魚肉，而沒有絲毫的浪費。華人屠夫可以在八刀之內，切出最多的魚肉。一天十小時的工作下來，可以處理兩千條鮭魚。⁹ 正因為鮭魚罐頭工廠非常依賴這批技巧熟練的華工，當排華法案通過造成華工日減之後，鮭魚罐頭工廠的資本家開始尋求機械自動化的方式，取代華人屠夫的工作。機械自動化對資本家具有雙重優勢。一來可以減少對熟練華工的依賴；二來可以解決華工日減的窘境。這套機器由一位白人 E. A. Smith 發明，稱為 Iron Chink。¹⁰ 這部機器的啓用，除了凸顯白人資本家在生產壓力下，欲圖減低對高薪華人屠夫的依賴，以降低成本之外；也扭轉鮭魚罐頭工廠內的勞工生態。原來佔有熟練技工職位的華人，開始由不需特別技術的低薪工人取代，如新入美國的日本人或是菲律賓人。¹¹ 值得注意的是，排華法案之後，華工人數日減；在同族勞工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華人開始介紹一些日本人進入罐頭工廠，從事較無須技術的工作，如清洗魚身、剝鱗等工作。¹²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需要經驗累積的職業。例如在舊金山地區，白人開設的自助式小型飲食店，會雇用華人為廚師，主要是因為華人進入此業較早，技術純熟，遠超過日本人。後者則成為二廚或是送菜至吧台之服務生，再由白人顧客自行領取。此

9 Margaret Willson and Jeffrey L. MacDonald, "The Impact of the 'Iron Chink' on the Chinese Salmon Cannery Workers of Puget Sound," in Paul D. Buell, Douglas W. Lee, and Edward Kaplan, eds.,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Bellingham: WA, 1984), 80.

10 因為 Chink 這個字眼對華人的歧視意味濃厚，由機器名稱可以看出這個白人對華人的敵視。見上引文，頁 82、85。

11 上引文，頁 81、86。

12 有關鮭魚罐頭業，華人與日人的仲介關係以及日後彼此相處的糾紛，可以參見 Chris Friday, *Organizing Asian American Labor: The Pacific Coast Canned-Salmon Industry, 1870-1942*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一書，尤其是第二章處理勞力仲介的狀況。

外，日本人也逐漸進入家庭傭工之業並進而取代人數日減的華人。¹³

但是華人經營仲介日本勞工最多的是在農業方面。契約包工制度早在一八六〇年代華人從事太平洋區段的鐵路建築時期即開始實行。進入七〇年代，這項制度對於開發加州的農業發展，發揮極大的功效；尤其是在沙加緬度河 (Sacramento River) 和聖華金河 (San Joaquin River) 三角洲地區，把該區沼澤泥地改造為瓜果菜園。¹⁴ 因為種植蔬菜瓜果，需要大量而密集的勞動力；採收時期，尤其如是。通常白人僱主委由華人契約工頭去募集摘種或收成時所需的大量人手。計價方式有按農地面積計算或是支以每日工資等不同方式。十九世紀九〇年代，大量的日本人湧入加州的農業地區，他們成為華人工頭下的契約工人；此後並出現一些日人契約工頭組織日本勞工，逐步取代華工，向白人僱主包攬種植工作。¹⁵ 根據一項研究，大約在九〇年代中期，已經有較大規模的日裔契約工頭和其所屬的勞工群，其中有些是日本工頭招募夏威夷地區的日本人而來的。這些日本工人開始挑戰種植事業一向任用華人的慣例，甚至低價向白人園主、場主爭逐工作機會。例如加州北部栽植蛇麻草 (hop) 以供應釀酒原料給啤酒廠。採摘蛇麻草的工人之工資，在一八九〇年代時期，華工一週的工資是五塊美金。日本勞工初入此業時，以一日三十五或四十分、一週工資不及當時華工之半的代價，爭取第一份工作。此後當日人漸眾，取代華工之後，才逐步要求加薪。¹⁶ 此外日人也使用預付現金的方式向白人承租果園，用以擊退華人按收成比例與園主拆帳、以茲抵扣租金的方式；由此逐漸獨攬愈來愈多的果園種植行業。¹⁷

13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Sen doc. 61st Cong., 2nd sess., (1911), pt. 25: Japanese and Other Immigrant Races in the Pacific Coast and Rocky Mountain States, Vol. 23. *Japanese and East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 186; Vol. 24. *Immigrant Labor in Agriculture and Allied Industries of the Western States*, 18.

14 關於華人開發加州農地及其對加州農業的貢獻，見 Sucheng Chan, *This Bitter-Sweet Soil: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860-19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該書第五章詳析華人在沙加緬度河和聖華金河三角洲地區的發展。其中頁 176, 177, 181, 183，都有述及華人契約包工制度如何進行。另頁 38 則簡述建築鐵路時期的華人包工制。

15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Sen doc. 61st Cong., 2nd sess., (1911), Vol. 24: *Immigrant Labor in Agriculture and Allied Industries of the Western States*, 105.

16 同上，頁 27、160。

17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June, 1908 (San Francisco: Organized Labor Print), 25.

然而，華人與日本人在西部農墾地區的競爭情勢，為時甚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排華法案的效益逐漸彰顯，新的華工不易進入美國，而一些舊有的華人離境之後，美國華人總數逐漸減少；再加上有些華人年老力衰，不堪勝任粗重的農事，而遠離鄉村、移居大城市的華埠區內。¹⁸ 在日裔勞工取代華工的初期，雖然有些白人場主因為對日工不夠熟悉，因而有所遲疑顧忌，不願加以雇用。但是當整個西海岸地區勞動力持續缺乏的景況之下，白人開始試用日本工人，並一步步地以後者替補華人離去所留下的工作。這種狀況持續進入二十世紀。在新世紀的前十年間，日本人已經成為加州農業的主要勞動人口。根據一九一一年美國移民局的調查報告，明白顯示當時加州地區的日本人已經取代華人，佔據後者二十餘年前在加州農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¹⁹

除了經濟層面之外，華人和日人移民在社會層面也呈現相互牽連的情況。其中，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機制是一個重要前提。白人以不同的態度對待華人和日人，這種差別待遇攸關華人與日人之間的情感。西岸各州中，華工是第一個遭受到白人歧視、迫害、進而被限制入境的少數族裔。十九世紀的最後十數年間，當華人被大肆抨擊之際，白人認定日本移民才是優良的亞洲人。但物換星移，到了二十世紀之交，情勢逆轉。由於一八八二年排華法案通過時，以十年為限期，再檢討法案內容。此後因為該法案有效地阻斷華工進入美國，曾經延續兩次。至一九〇四年更將此一法案規定為永久性地限制華工入境。排華活動至此算是劃下完滿成功的句點。相對之下，這一段時期，日本人移入美國的數目，不斷地創新紀錄。人數一多，日本人就成為下一波白人工會和種族歧視團體的攻擊對象；此時華人反倒成為美國白人心中比日本人謙虛而且不再礙眼的一群人。即使如排亞聯盟 (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這類敵視亞洲勞工的組織，也不時出現對華人和日人有不同的評語。在其每月會議記錄中，經常轉載其他報紙有關亞洲勞工之討論，並加以批評。例如他們刊載（果園）農場場主抱怨日本工人要求加薪至

18 華人因為年長而不利於體力操作之工作，也見於鮭魚罐頭工廠中。一九一〇年阿拉斯加的一些鮭魚罐頭工廠曾經調查廠內日本勞工的平均年齡為二十九歲；華工則約為四十八歲。見 Chris Friday, *Organizing Asian American labor*, 114.

19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Sen doc. 61st Cong., 2nd sess., (1911), Vol. 24: *Immigrant Labor in Agriculture and Allied Industries of the Western States*, 26.

白人勞工的水準，並評論那些場主又何必當初，允許這些日本人進入美國呢？²⁰ 排亞聯盟提及支持排華法案的農場場主日後將後悔沒有將日本人也放入排擠名單中，因為在華、日兩類人物中，華人算是最不令人討厭的 (Of the two evils, the Chinese is by far the least)。²¹ 從一九〇三年起，日裔移民提出加薪的要求開始引起美國白人僱主的厭惡而欲加以反制。一些白種農場主人因此懷念起華人，讚譽華人固守簽訂之契約，值得信賴，即使有更好的價碼，也是留待前份契約結束之後才轉換；較無野心，不會與其他種族工人比較而要求相同待遇。雖然華人被白人僱主認為年齡較長，手腳不夠伶俐，學習新農技較為遲緩；但是至少不似現今日本人的行止，經常提出莽撞而無理的要求；而且一旦其他場主提供更高的薪資時，則拂袖而去，毫無預警地失信於舊有簽約者。²² 此外，華人也被認為比日人老實可靠而不需老闆的監督。以種植甜菜 (sweet beets) 為例，華工插種幼苗時，保持應有的間距；日人則偷機取巧，縮短間距，簡化插種和收成時的工作難度，以儉省時間。另一個情況是，日人收成甜菜時，只採收突出地面的部位，不挖取埋在地底的部份（雖然有些墨西哥裔勞工亦復如此）。²³ 一九〇九年左右，美國移民局調查西部各州日本人的經濟活動時，認為多數華人離開種植農業以後，才有這類褒華貶日的言論出現。根據移民局的解釋，白人園主對華人的美譽，源自華人人數減少、較為稀有，再加上貶斥現在被大量雇用的日本人而產生的結果。(With their [Chinese] scarcity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putation of the races [Japanese] at present employed.)²⁴ 由加州、奧瑞岡州、和華盛頓州的一些白人農場場主褒華貶日的言論來看，大量出現的日本人已然成為西岸地區種族生態轉變的一個重要環節。

20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February, 1908 (San Francisco: Organized Labor Print), 16.

21 同上引。

22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July, 1908 (San Francisco: Organized Labor Print), 15; February, 1909, 7；亦見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1911), Vol. 23: *Japanese and East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4, 175, 176.

23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1911), Vol. 24: *Immigrant Labor in Agriculture and Allied Industries of the Western States*, 108, 109.

24 同上引，108。

美國白人褒華貶日的觀點，自然對華人和日本移民的關係有重大的影響。主流社會的白人經常認為，日本人大量湧入美國是填補排華法案之後華工被阻而產生的勞動力空缺；因而將日本人定位成華人的繼任人選。在白人的眼中，中國人和日本人在美國社會裡所扮演的角色既相近，人種又極為雷同，兩個族群的文化背景也是無太大的區別。然而，早期的日本移民對此認定則頗不以為然。他們以華、日移民適應美國社會環境能力的差異，舉例說明兩者之不同。²⁵ 早自明治維新時期，即有日本學生留學歐美國家。初期多為公費學生，但也逐漸出現自費留學海外的學員，以求學成歸國後，可以謀求較好的職位。從十九世紀八〇年代開始，早期日本移到美國本土的人士中，就有許多是學生勞工（日文稱為出稼書生）。這群半工半讀的日本人總是與中國移民劃清界線，以示彼此有別。當時，這些日本學生自認受過教育，是來自日本社會的中上層階級，容易適應美國習俗與生活方式。他們鄙視同處美國社會的中國工人，認為華工原在中國社會是處於下層階級的一群，因此附會白人排華的聲浪，贊同美國社會通過限制華工入境。²⁶ 雖然日本移民以階級差異的觀點鄙視華人；但檢視其論調，不難窺見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對日本移民的影響，促使身處多元種族體系下層的日本人，模仿白人的心態，附會贊同白人以貶抑、輕蔑的態度對待華人，而汲汲於和華人劃清界線。

事實上，日本人自認比中國人更能適應美國的生活方式，也是無可厚非。這可以由幾個例證說明。首先，雖然華人移居美國的時間較日本人為早，但是在美日本人的英語聽說能力比起華人的表現，略勝一籌。此中之故，在於許多日本人

25 有關日本西化的議題，可以回溯至十九世紀中葉日本的「明治維新」，欲圖藉由學習歐美典章制度而「脫亞入歐」，遠離日本鄰國如中國者而成為西方世界的一份子。當時的智識份子（如福澤諭吉）關心文明開化之問題，認為西方文化優於日本文化。福澤諭吉將日本、中國、印度等文明，都列入世界上半開化國家，其文學、藝術、工商業，皆不如西方國家。日本如要進化到高層次，則需要引入優良的西方成份，以取代中國儒教傳統。有關此論述，可以參考福澤諭吉之《文明論之概略》。一八九四年，中日兩國為了朝鮮半島的管理權益而爆發了甲午之戰，中國以割地賠款了事，增長日本的氣焰。日本認定盤據東亞大陸的中國，終將因為固守傳統，不圖改進而走向沒落。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日本擊敗歐陸大國蘇俄，再次獲得軍事上的勝利，強化日本實現世界先進工業國家的信念。此後日本即開始顯現其作為東亞強國的傲人氣勢，凸顯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的不同。

26 Yuji Ichioka, *The Issei: The World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Japanese Immigrants, 1885-1924*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8), 191.

來到美國之前，曾經居住過以英語系統爲主的地區或國家，如夏威夷或加拿大。因此，他們已經對英文的語言環境有所接觸，甚至頗爲熟悉。再加上一些所謂的「學生勞工」，原本在日本時，已經受過高中教育，其中包含英文文法的課程訓練，爲移居美國奠定基石，自然易於進步神速。²⁷

另一個例子則是有關服飾髮髻的變換。滿清統治之下，男人梳留髮辮的習慣，被飄洋過海的華人繼續帶至新移入的地區。這項外表上的特質，經常被美國白人指控爲華人不瞭解也不願意適應當地生活環境的例證。由於美國社會將男性蓄留髮辮當成未開化、不文明的指標之一，華人這項特有的外觀，就成爲受人言詞輕蔑或肢體傷害的根源所在。相較之下，日本移民在衣著外表上，與華人顯現極爲不同的面貌。日本人夏天因爲天熱，有時只在腰間繫上束帶而不著上衣或只有一件輕薄如浴袍似的衣物，足蹬木屐。十九世紀末葉，西岸地區的日本鐵路修築工人，被其同族工頭要求不得以此裝束工作，即使酷暑之際亦然，以免引來白人嫌惡的眼光，並留下口實，遭人迫害。不僅是外觀之衣著，在美國的日本人也調整其他生活步調，轉換爲當地的方式；甚至日常食物，也盡量改換成美式食品。²⁸美國移民局的報告裡也述及，雖然許多移民都非常節儉，但是日本移民比華人（也比其他族裔，如義大利裔、葡裔或俄國移民等）花費較多的錢財於美國生活上，如購買服飾、租屋、雜項之開支。²⁹

雖然在美國的華人與當地日本人有這些差異，但由一些華人的行動，不難見出一些端倪，顯示其漸變的趨勢。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時值滿清帝國國勢式微之際，越來越多的美國華人剪去髮辮，並且改著西服。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此一轉換不僅展現在初臨異地的年輕人身上，還出現在居美數十寒暑而一再拒絕變換爲美式襯衫長褲的一群老華僑之中。對於後者，舊金山當地的一份華文報紙，特別致以誠摯的敬意。根據該報的論述：

27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 February, 1908*, (San Francisco: Organized Labor Print), 23;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23: *Japanese and East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48-9; Vol. 24: *Immigrant Labor in Agriculture and Allied Industries of the Western States*, 59.

28 Yuji Ichioka, *The Issei*, 185.

29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1911), Vol. 23: *Japanese and East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38.

夫以不通英語之人拖長辮穿華服。遊行於西人街中。西人見其異狀而侮辱之。而彼不能以西語與之爭論，則其侮辱也愈甚。由此觀之，我華僑有未通西語者，則剪辮更宜早也。且剪辮改裝者以不通英語見笑於朋輩，則由愧生憤，學習英文，更為勉力，且藉此以造成有用之才。由此觀之，則先剪辮而後學英文，猶勝於先學英文而後剪辮也，又何有不通英語之足慮乎。³⁰

此等論述之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日本人的關連，但適值排華法案通過變成永久執行，而日人湧入美國達到高峰之際，其中似乎傳達了一些訊息。亦即日本移民之到來，給華裔移民不無一些刺激和壓力。至少外觀上和言辭表達上較為西化的日本僑民，推動同為亞裔的華人加速其同化於當地社會的腳步。

日本移民極力反抗白人社會將日人和華人相提並論。初進二十世紀新紀元，在一九〇二年排華法案十年期限將屆，需要重新檢討法案成效之際，西部各州一些排華人士醞釀將日本和其他亞洲人種一併歸入排斥入境的對象裡。以當時西部地區歧視黃種人的氛圍，日本人不得不敵視華人，貶斥華人比日人更為低下，避免被白人視為與華裔乃同路人，以此保障其地位。一些日本移民為了抗議任何限制日本人士進入美國的規定，同聲附和自種排華人士的論點，以此提升自我身分，強調日本民族的等級和美國白人相互匹配。³¹當此之際，欲圖結合不同的亞裔族群，以組成亞裔之間的廣泛聯盟，共同爭取在美國社會的公平權益，不啻是緣木求魚的空想。

二、華僑的中國民族主義

心向母國的民族主義，乃是一條臍帶，牽繫著中國與海外華人。母國的一舉一動，海外中國人迅速地受到影響而有所回應。美國華人在當地遭受白人的排擠和歧視，更進一步促使他們關注中國的政經局勢，冀望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可以幫助海外華人改善在居留國的待遇和社會地位。東亞地區國際間的任何變革，

30 《中西日報》，1906年6月21日、24日，頁2。

31 Roger Daniels, *Politics of Prejudice*, 21-3.

不免也左右了美國華人看待當地日本移民的方式。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陸續遭受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欺凌。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利，與日本簽下馬關條約，使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澎湖、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日俄戰爭之後，日本軍國勢力加緊對中國滿洲和蒙古地區的侵略活動。種種行徑不斷加深美國華人和日人的分裂，而不顧念彼此作為開發美國西部的勞動力，曾經走過許多相似的路程。³² 隨著國際情勢的遞嬗，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卻也激發中國境內一股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和愛國意識，匯聚成自發自覺的民族主義。這股濃厚的愛國情操，逐漸傳送到海外的遊子身上。身處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白人國度的華人，受盡當地白人的敵視和污蔑，更是熱切地擁抱這股中國民族主義。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面對日本國際地位的揚升，中國民族意識高漲的美國華人不時表達了忌妒日人、責難自家的雙重情緒。一九〇六年年初一封讀者投書刊登於《中西日報》上，作者描述搭乘中國皇后號輪船歸返中國時，他所觀察到船上白人看更給予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差別待遇。該船沿途停靠橫濱、長崎、神戶，和上海等埠，當船停泊上述日本港埠時，當地商販被允許到船上叫賣什物雜貨；即使在當時正有瘟疫流行之地如神戶者，亦復如是。船行到了上海港之後，白人看更卻禁絕中國的商人到船艙進行販售。有兩個商販更因此被白人看更推落至海中，高聲呼喊求救，引起船上華人乘客的注意，才揪住看更，要求船主加以處置，以平息眾人之忿。然而投書的作者感嘆道：

嗚呼！日人與華人何異？同是亞洲人也，同是黃種人也。乃西人待日人則如此其優禮；待華人如彼其暴虐者，何哉？亦懾於日國之強，欺吾中國之弱；懾於日人之能自立，欺吾中國人之不能自立；懾於虐待日人日人必起而報復之，欺吾中國人雖極虐待之而無奈彼何也。³³

行文之中，固然對日人的境遇頗多妒忌與欽羨，卻見更深邃的感嘆與責備炎黃族人之軟弱。作者雖然批評白人船主必定縱容手下多時，才會養成西人看更對華人

32 Margaret Willson and Jeffrey L. MacDonald, "The Impact of the 'Iron Chink' on the Chinese Salmon Cannery Workers of Puget Sound," in *The Annals of th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86.

33 《中西日報》，1906年1月13日，頁2。

之氣燄如此之囂張跋扈；卻也不免痛心同船之上其他華籍船工的懦弱，認為「西人之所以如此虐待吾同胞者，亦由吾國賤種爲之俚也。何也？吾國人有在此輪船司理伙食者，見西人殘虐同胞而不惟袖手旁觀，反爲之助其惡而揚其波」。一句「吾國賤種爲之俚也」指明中國人卑屈的奴才品性，只會加深白人對中國人的輕蔑，言辭之中滿溢受辱後的忿恨難平與羞愧自責的複雜情緒。

同年四月十八日舊金山市發生空前的大地震。震災期間發生一些小插曲，可再次印證前述投書作者的評論。日本在地震發生之後，以大量物資財力援助該市的復原和重建工作。即使如此，當地的排日風潮卻有增無減，愈形暴戾。當年六月，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幾位地震專家遠赴舊金山實地照相勘查災區。調查行程期間，這些日籍專家遭受幾位白人送信郵童丟擲石塊的攻擊。在美日本人會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隨即致書給郵政總局，表達其不滿和抗議。一位郵局官員因此親自登門拜訪該會，陪禮認錯，致上歉意，並且聲明查革肇事郵童。華人報紙報導此則消息時，特別加以眉批爲「有國體者如是」。³⁴ 與此正好相反的是，一名熊姓華人在地震之後，回到舊金山華埠，欲從震後大火餘燼裡尋找一些個人的衣物。搜尋當中，被幾名白種孩童惡意以石塊擊中，送醫不治。《中西日報》的編輯評論比較兩個事件而發出如下的感慨：「我弱國僑民隨在可危矣！能不爲同胞吞聲一咽耶？」。它除了哀悼熊君性命與悲歎華僑生命受脅之餘，也指責美國中華公所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簡寫爲 CCBA) 和舊金山地區的中國領事等衰衰諸公，不如日本人會之行動敏捷，對出面爭取本族人之權益一事，冷漠以待，毫無建樹。³⁵

事實上，美國華僑的報紙中，要求母國政府或華人團體之領袖出面保護僑民的議題，屢見不鮮。由於排華法案將在一九〇二年到期，早幾年前，西部幾州的排華團體就開始進行遊說，希望國會延長這個法案。到了一九〇四年，老羅斯福總統終於簽署排華法案無限期地禁止華工入境。此舉造成次年中國各大城市發動

34 《中西日報》，1906年6月17日，頁2。有關日本地震專家受擊事件，又見於 Roger Daniels,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33.

35 《中西日報》，1906年6月19日、20日、22日，頁2。

抵制美貨運動。³⁶ 美國政府爲了緩和這個經濟危機，允諾將在下一個國會會期修改法案的部份內容和規章，以此換取中國政府的配合，防堵抵制美貨運動的擴大。但是直至一九〇六年的夏天，眼見國會會期即將於七月一日休會，卻仍然毫無動靜，看來修改無望。一向關注華人權益的《中西日報》，大肆抨擊美國政府無信，同時也慨嘆「美無信而清不敢詰問之」，因爲滿清王室昧於美國以門戶開放之說呼籲各國保全中國領土，因此對美國持有一份特殊情感而甘心忍受該國政府以粗暴而不公平之手法對待華僑。³⁷ 一位美國學者比較中、日兩國政府保護在美僑民的方式之時，指出與衰弱的中國政府對照，日本政府既嚴加督導管束其海外移民，也對之多所保護。尤其自十九世紀最後十數年起，大量日本勞工進入美國境內，日本派駐海外官員對這群工人可能滋生的問題，例如嫖妓與聚賭的出現等，經常回報政府，提供建議。³⁸

即使美國華僑對清政府護僑不力，多有怨言；他們對祖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因此而有所動搖。民國建立之後，中日兩國之間的恩怨情仇，仍然牽動美國華人對日本國的好惡。辛亥革命之前，當時許多革命志士，接受日本支助。日本政府曾經允諾孫中山先生，一旦民國建立，日本將率先承認新成立的政府。革命成功之後，相較於美國立即表現出的慶賀之意，日本卻唯恐中國革命激進的意識形態，傳染到日本，影響其專制皇權體制，而有所畏縮遲疑。《中西日報》評論「各國野心未去猶或可恕，日本以同文同種同洲同教，又言之在先，至此後與野心諸國無異也？」。³⁹ 以同文同種同洲同教的說詞描述中日之間的關係，較之於其他西方國家，足見美國華人對日本仍有頗多之期待。只是一九一三年間，巴爾幹戰雲密布，使歐洲列強無暇顧及亞洲情勢。日本以英日同盟之由，假借對德宣戰，意圖出兵佔據德國所租借的山東半島，佔有膠濟鐵路沿線和青島。表面上

36 有關此事件，見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

37 《中西日報》，1906年6月16日、19日，頁1。

38 見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101, 103, 104。但是日本人的研究則顯示在美日本移民對於日本政府保護僑民的作爲，頗有微辭，認爲日本政府經常爲了外交因素而犧牲僑民的權益，並無善盡保護之責。見 Yuji Ichioka, *The Issei*, 4；有關管制嫖妓和博奕行爲，可見該書，37-9, 85-8。

39 《中西日報》，1913年4月15日、19日，頁1。

日本以中日協約、中日同盟之名，維繫兩國關係，以免中國倡議杯葛風潮，抵制日貨。私下則持續擴張從日俄戰爭得自俄國在東三省和內蒙的權益。如此譎詐的日本政府，使海外華僑也和母國同仇敵愾，與日人反目。⁴⁰

一九一五年的中日二十一條款交涉，引起中國廣大民衆的反對。二月以後，中國各重要城市皆發動抵制日貨行動。這項活動，也傳播到海外許多華人社群，如東南亞和北美地區。在美華人基於對日本的厭忿，也呼應母國的抵制日貨行動。但是此舉在美國境內卻掀起中日兩個族群間嚴重的衝突；其中尤以加州地區最爲熱烈。舊金山市的華人發動不買日本的絲製品與陶、瓷器用品；也不代銷日本貨品。⁴¹除此之外，也禁止華人進入當地日本人所經營的洗衣館、理髮店、澡堂。日本僑民卻藉此機緣，推動反制運動，禁止日本移民涉足華人經營的餐館和賭館。固然相互抵制之下，華人商機不無受挫蕭條。尤其日人放出風聲，宣稱抵制日貨之舉，華人受害將多過日人。即便如是，舊金山市及其他加州城市如奧克蘭、洛杉磯等華人聚集的社區，仍是如火如荼地持續抵制日貨。⁴²

針對博奕之事，日本僑民領袖，早就爲日人沉溺於華人賭館無法自拔而發愁，卻一直苦無對策，不能有效地管制。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之交，日本移民大量進入西海岸地區，白天揮汗工作，夜晚則沒有太多娛樂。當時這些第一代的日本僑民，一如華人，並無家眷隨行。長夜苦寂之下，許多日本人沈溺在華人所經營的賭局中。華人賭館原是十九世紀末葉華工開發美國西部時所遺留下來的產物。隨著排華法案的推行，華人日減，日本人取代華人成爲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卻也因緣際會地成爲華人賭館的座上客。早在一八九九年即有紀錄顯示西北部的鮭魚罐頭工廠的日本勞工與華人勞工，因爲賭局糾紛而發生鬥毆事件。⁴³梁啓超於一九〇三年期間遊歷美洲大陸時的遊記，記載了他所觀察到一些北美華人的生活情況，就曾經提及華人的嗜賭之風，甚至使得賭博成爲一個專門行業。根據

40 同上引。

41 在加州的大都會區有一些東方藝品店，多爲華人或日人所經營。兩者彼此之間有時一起分享客源，如舊金山地區；有時則是相互競爭，如洛杉磯地區。見 Reports of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Vol. 23: *Japanese and East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8, 234.

42 《中西日報》，1915年2月19日、24日、25日，3月5日、12日，頁1-2，4月2日，頁7。

43 Margaret Willson and Jeffrey L. MacDonald, "The Impact of the 'Iron Chink' on the Chinese Salmon Cannery Workers of Puget Sound," in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 86.